

弘扬三大精神 奋力建成支点

深刻把握三大精神的生成逻辑

□荣枢

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与抗疫精神同属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湖北地域特色鲜明的精神标识,是湖北需要结合新时代条件持续传承的精神血脉。其生成过程蕴含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入剖析三大精神的生成逻辑,有助于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时代内涵,有利于推进三大精神的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与内化转化工作,为湖北加快建设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精神支撑。

重温三大精神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三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有着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与时代性实践。三大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展现了理想信念伟力、集体主义优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坐标。

大别山精神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大别山军民在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勇夺胜利的精神支柱。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的革命征程中,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二十八年红旗不倒,二十二年武装斗争不断,这片红色热土见证了数十万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壮烈牺牲。“山岩石洞是我床,树皮野菜是我粮,任你敌人多猖狂,红旗不倒志如钢。”这是当年大别山地区流传的歌谣,大别山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黄麻起义、回龙山暴动、商南起义、中原突围等等,展示了大别山英雄儿女钢铁般的意志和永不动摇的信仰。无论是革命高潮时的奋勇前进,还是低谷时的艰难坚守,大别山军民始终以信仰为引领,用生命诠释了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抗洪精神集中展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1998年汛期,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涝灾害,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协作模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了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逻辑。此后,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功保卫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捍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将灾害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在中国人民多次气壮山河的抗洪斗争中,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更加坚不可摧,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凸显,当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筑起人墙,当普通群众自发组成抢险突击队时,个体的生命价值在集体事业中得到了升华。

抗疫精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在重大危机面前,对待生命的态度检验一个政党的道德良知和价值取向。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天灾,更是一份国家治理的特殊命题考卷。“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答卷上的郑重作答。家国情怀体现了家国一体的价值认同与人生追求,舍生忘死是一种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对垒,尊重科学的求真情怀,是用强大的科学武器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抗疫精神的核心是“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全国各族人民都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了这场疫情防控斗争,绘就了举国同心的时代画卷。

深挖三大精神民族基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时代光芒

三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铸就的精神丰碑,植根于中华民族文明沃土之上。三大精神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更是这些文化基因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别山精神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基因。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大别山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开展高质量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应依托革命遗址、纪念馆、英雄事迹等具象化载体,构建沉浸式、系统化的党性教育体系,将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融入理论学习、现场教学与实践锻炼全过程。大别山区兼具生态资源禀赋与区域协同潜力,应立足“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关键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立足本地、服务全局”的实践探索,培育引领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为中部崛起重大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抗洪精神在湖北的实践,彰显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底色与超大城市治理智慧。作为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武汉因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特殊地理

区位优势,自古便是长江流域防洪的关键节点。在历次特大洪水考验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武汉人民以“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推动防汛治理实现从以人力投入为主的“人海战术”,逐步向依托现代科技的智慧防汛跨越。在治理理念层面,武汉始终坚持工程防御与生态治理协同的科学逻辑,一方面通过加固堤防、建设排涝泵站等传统工程手段夯实防洪基础;另一方面创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生态驳岸建设、滨水空间优化等具体举措,以绿色发展理念巩固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支点建设。

抗疫精神发轫于武汉,其生成实践塑造了新时代城市治理的价值坐标。在2020年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武汉通过党组织统筹协调、专业机构技术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协同机制,成功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抗疫精神力量在湖北地区持续转化,推动治理现代化不断突破,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与智慧城市深度融合,构建起完整的数字化防控网络,战时志愿服务机制创新性转化为常态化基层治理平台,将“全民战疫”的动员经验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长效动能。武汉抗疫实践不仅锻造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精神利器,也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作出有益探索,“英雄城市”的崇高荣誉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持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在新时代抗疫斗争中进一步实现了从文化基因到时代精神的升华。

探索三大精神时代价值,凝聚支点建设强大精神力量

三大精神历久弥新,必将转化为推动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的精神力量。

作为革命历史的精神凝结,大别山精神既由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所造就,更因新时代的发展诉求而彰显现实意义。大别山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开展高质量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应依托革命遗址、纪念馆、英雄事迹等具象化载体,构建沉浸式、系统化的党性教育体系,将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融入理论学习、现场教学与实践锻炼全过程。大别山区兼具生态资源禀赋与区域协同潜力,应立足“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关键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立足本地、服务全局”的实践探索,培育引领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为中部崛起重大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抗洪精神在湖北的实践,彰显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底色与超大城市治理智慧。作为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武汉因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特殊地理

区位优势,自古便是长江流域防洪的关键节点。在历次特大洪水考验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武汉人民以“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推动防汛治理实现从以人力投入为主的“人海战术”,逐步向依托现代科技的智慧防汛跨越。在治理理念层面,武汉始终坚持工程防御与生态治理协同的科学逻辑,一方面通过加固堤防、建设排涝泵站等传统工程手段夯实防洪基础;另一方面创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生态驳岸建设、滨水空间优化等具体举措,以绿色发展理念巩固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支点建设。

抗疫精神发轫于武汉,其生成实践塑造了新时代城市治理的价值坐标。在2020年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武汉通过党组织统筹协调、专业机构技术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协同机制,成功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抗疫精神力量在湖北地区持续转化,推动治理现代化不断突破,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与智慧城市深度融合,构建起完整的数字化防控网络,战时志愿服务机制创新性转化为常态化基层治理平台,将“全民战疫”的动员经验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长效动能。武汉抗疫实践不仅锻造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精神利器,也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作出有益探索,“英雄城市”的崇高荣誉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持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在新时代抗疫斗争中进一步实现了从文化基因到时代精神的升华。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潮流中才能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湖北篇章”,虽孕育于不同历史时期,却共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具有鲜明的地域关联性和内在统一性。三大精神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其实践脉络本质上是党与人民“血肉相连、命运与共”根本立场的展开。团结奋斗是三大精神一以贯之的实践标识,其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却始终指向“顾全大局、共克时艰”的集体主义。三大精神的生成与传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扎根于荆楚文化的底蕴,更是民族精神在湖北的地域化呈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弘扬并传承三大精神,需着力推动精神力量向实践动能转化,让伟大精神绽放新时代光芒,为书写湖北篇章提供强劲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弘扬大别山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张昊

大别山,一座镌刻着忠诚与信仰的红色丰碑,一部书写着牺牲与奉献的英雄史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铸就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淬炼了大别山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武汉作为湖北省会和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在支点建设中择高而立、向上而行。勇担责任、奋楫争先,要铸牢理想信念这个根本,掌握团结奋斗这个法宝,淬炼斗争本领这个关键,在弘扬大别山精神中赓续红色血脉,在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

铸牢理想信念这个根本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从黄麻起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的革命动员到中原突围“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选择;从“甘心直上断头台”的王幼安,到“长征先锋、孤军奋战”的吴焕先,再到“纵身跳崖”的晏春山,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政治追求。大别山地区坚持“二十八年红旗不倒”,成为全国坚持革命斗争最长地区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别山区军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绝对忠诚。

今天,铸牢理想信念就是要让“根”更牢,让“魂”更固。要以红色资源为“活

教材”,深入挖掘大别山革命史、武汉城市奋斗史中的精神富矿,用“看得见的信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以理论武装为“压舱石”,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领悟,特别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建成支点的历史使命转化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具体实践。要以初心使命为“定盘星”,时刻铭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厚植为民情怀,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站稳人民立场,确保在支点建设中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掌握团结奋斗这个法宝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鄂豫皖苏区能够二十八年红旗不倒,新四军能够在江淮大地同敌人奋战到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够站住脚、扎下根,淮海战役能够势如破竹,百万雄师过大江能够气吞万里如虎,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这种“上下同欲者胜”的勠力同心,体现出大别山区军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品格。

当前,武汉正处在转型闯关的关键

时期,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砥砺奋进。要在思想上同心同德,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支点建设的战略任务上来。要紧紧抓住支点的战略重心,聚焦当好龙头、走在前列的具体要求,将武汉的“强核引领”与全省的“多极联动”有机结合,推动区域规划协同、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开放协同、生态协同,让“龙头”昂得更稳、“龙身”摆得更活。要在行动上同力同向,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联动机制,推动政策、资源、要素向支点建设集聚。正如革命时期大别山区人民“男女老少齐武装”,武汉用“心往一处想”的团结意识、“劲往一处使”的奋斗姿态,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强向心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

淬炼斗争本领这个关键

我们党在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勇气和“化整为零、灵活作战”的智慧,勇挑重担,勇当前锋,不胜不休,彰显出顽强的斗争意志。支点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武汉在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必然会遇到许多重大挑战,必然要经历考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淬炼好斗争本领,才能在挑战中把握机遇,在风浪中稳舵前行。

斗争是一门艺术,既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又要讲究斗争策略,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以居安思危的清醒洞察“船到中流”的挑战,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毅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忧患中锤炼战略韧性,在坚守中积蓄变革动能。要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立足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维把握发展大势,在支点建设中正确处理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与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等重要关系,牵住武汉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要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牢牢锚定科技创新的突破方向,准确判断科技创新的前沿趋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把“卡脖子”制约变成“卡位”优势,促进科技成力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为武汉在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夯实硬支撑。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从“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到“英雄城市再出发”,让大别山精神转化为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用理想信念的灯塔照亮前行之路,用团结奋斗的合力激荡发展之势,用斗争本领的锋芒破解发展之难,以奋进之姿加快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

(作者单位为武汉市委党校)

青马在线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工智能看作为“国际公共产品”。这种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理念,本质上是对“技术资本化”逻辑的根本超越,将技术发展从“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转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突破了传统技术垄断的资本逻辑。

人工智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应当增进人类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科技成果应当增进人类福祉,而不应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

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技术断层”与“能力洼地”,中国提出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知识共享的主张,将技术发展的“生产力解放”属性置于国际关系重构的核心位置。这一战略选择不仅彰显了大国责任担当,更体现了对全球技术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国主动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将技术推广从市场驱动升级为制度保障。《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的“发展优先、普惠共建”原则,正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理念”在全球技术治理领域的具体映射,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从“竞争主导”向“共享驱动”的范式转换。传统国际公共产品集中于气候、卫生等领域,中国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纳入供给范畴,体现了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瞻性判断。在尊重技术主权基础上,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实现要素流动、知识共享与能力共建,破解“技术霸权”与“数字殖民”的结构性矛盾。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然而,技术革命盛宴下潜藏着深刻的全球性隐忧——智能鸿沟。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积累、资本优势和人才资源占据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制高点,而全球南方国家则因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资源匮乏和技术能力不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鸿沟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还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与文化对立。在此背景下,中国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并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弥合智能鸿沟。这一主张超越了传统技术竞争的逻辑,将人工智能的伦理属性与全球公共福祉紧密结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了新的实践内涵。能够在坚守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承担大国责任,这正是智能时代最需要的“中国智慧”。

全球智能鸿沟加剧各国科技不平衡发展

从全球智能鸿沟的现状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技术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全球人工智能研发投入与硬件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技术瓶颈。其二,三重数字鸿沟叠加。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技术应用薄弱和自主创新力匮乏等问题,形成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劣势。其三,数据垄断与规则主导权争夺。发达国家控制全球80%的数据流量,发展中国家因缺乏本地化存储能力,难以训练适应本土需求的AI模型。而且发达国家人工智能技术载体受制于发达国家供应链,而治理规则的不平等化加剧了全球协作难度。

从全球智能鸿沟的具体表现来看,全球智能鸿沟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其一,技术壁垒与“智能贫困陷阱”

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强化地缘政治优势,发展中国家可能沦为数据原料供应方,陷入“智能贫困陷阱”。通过技术创新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构建技术壁垒。然后通过技术垄断限制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如中国AI芯片出口受限于供应链安全与市场信任问题,直接制约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

其二,治理规则的单边化与“规则特权”。全球缺乏统一治理框架,意识形态差异导致治理路径分歧。美西方组建排他性技术联盟,发展中国家面临“规则接受者”困境和“技术殖民”的风险。

其三,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分化。发达国家资本主导的智能技术发展路径可能异化为控制工具,威胁人类主体性与社会公平。资本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特权”,发达国家通过算法黑箱可能系统性剥夺弱势国家发展机会。未受弥补的智能鸿沟可能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发展中国家承受更多负面冲击。发展中国家因技术能力不足被排除在智能服务体系外,基本发展权益难以保障。

中国提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既是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对多边主义价值观的坚定践行。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工智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系统性输出,通过技术赋能、规则共建、生态协同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破解全球智能鸿沟这一世纪课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技术进步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

持续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主导制定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技术治理注入互信元素,推动建立包容性多边治理框架。特别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制定中,中国提出的“技术可控性”与“文化适应性”原则,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

其一,坚持“平衡普惠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始终坚持“平衡普惠发展”的基本立场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这一原则体现为对南方国家“技术主权”的坚定维护。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明确反对技术封锁与单边制裁,主张建立技术转移的国际补偿机制。这与习近平提出的“平衡普惠发展”主张一脉相承,强调治理规则应优先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接入权、数据自主权和发展参与权。

其二,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架构。人工智能治理不能成为少数国家的“小圈子游戏”,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倡导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金砖国家创新伙伴计划、中国—东盟数字经济论坛等多边平台,中国着力推动形成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技术社群、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架构,打破“技术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

其三,推动形成普惠发展的智能文明形态。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实践,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在数字文明时代的秩序重构。中国以“兼济天下”的文明胸怀,将技术治理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整体框架。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治理规则互鉴,从发展理念共融到创新生态共建,中国方案正在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坐标。在迈向智能文明的新征程中,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自觉,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技术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跨越发展鸿沟的桥梁,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工智能「中国式」,超越了「技术资本化」逻辑

□侯耀文 胡跃明

